



香江佳城

香港華人古墓兩千年史

梁基永 著



商務印書館



梁基永，生於廣州，古典文獻學博士，文獻學者與書畫家。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榮譽副研究員，香港古琴研究會會長，香港天風畫會主席等，專長為藝術史，明清歷史人物研究，近著包括《道從此入：清代翰林與香港》等多部。

封底圖片：

明代鄧龍岡墓誌拓片，何幼惠等題字，朱樂庭拓

香江佳城

香港華人古墓 兩千年史

梁基永 著



古墓史，替亡者說事，為生者尋根。採石江邊探舊墓，繞田無限草連雲，梁基永讓沉默的墓地有機會發聲。聲音裏，有人情與世變，有斷裂與延綿，一切其實跟人間故事不離不棄。如筮師，如召魂，這書，引領亡者與生者對話，是歷史研究，亦是人倫功德。

——香港作家 馬家輝

基永兄出身廣州西關書香門第，家學淵源，自幼潛心書畫古籍，學養深厚，尤對廣府文化認識精到。近年於研究古代文獻之餘，走訪港九新界古墓，並編纂成書，對形制、工藝、銘文、風水，一一考證，娓娓道來，知識與趣味兼具，文中提出「廣府墓前半部在廣州，後半部在香港」，旨哉斯言，誠意向大家推薦。

——香港學者 丁新豹教授



陳列類別：中國歷史
HK\$ 158.00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LTD



文化閱讀 購物平台
mybookone.com.hk

ISBN 978 962 07 6700 5



9 789620 767005

責任編輯：韓心雨
裝幀設計：涂慧
排版：肖霞
校對：趙會明
印務：龍寶祺

香江佳城：香港華人古墓兩千年史

作者：梁基永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發行：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荃灣德士古道220-248號荃灣工業中心16樓
印刷：待補

版次：202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2023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 962 07 6700 5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目錄

引言	001
上篇 古墓中的半部香港史	
第一章 上古至漢代古墓	001
第二章 晉唐至宋元墓葬	001
第三章 明代香港墓葬：並非空白期	001
第四章 清代早期至開埠前墓葬	001
第五章 晚清至民國墓葬	001
中篇 香港古墓叢談	
第一章 廣式墓葬的構件與工藝演化	001
第二章 福德公、義塚與壽基	001
第三章 墓廬：禮失求諸野	001
第四章 繞不過的風水：香港堪輿觀念史	001
第五章 翰墨之光：墓碑中的香港書法史	001
下篇 香港名墓探尋	
結語	001



柏架山上立於道光二十七年的曾氏福德公之墓碑是港島現存最古老的有年款碑刻

並且抬到海拔兩百多米的山坡上。考察柏架山附近的石質，與此石非常接近，如果曾家是在發家之後，再重新營造，則此墓碑反而會選用較為名貴的材料（如後文將提到的連州青石等）。

因此這方墓碑在選材、字體等方面看，大概率應該屬於原物。曾氏福德公墓碑的價值在於，這是港島區現存最早的有年款墓碑。港島區在開埠之前，並不是沒有原居民，例如南區薄扶林村一帶，乾隆時已經有定居的氏族，但是開

埠之前的墓碑，並沒有完整保留。港島目前所見，最早有年款的文物，是天后廟道天后古廟中所懸掛的乾隆年款的鐵鐘，而排行第二位的，則應屬此福德公墓碑，排行第三的則是灣仔「洪聖古廟」內的石雕燈座，年款為道光二十七年（1847），那已經是香港開埠之後了，不過從材質和書法看，兩者非常接近，也預示了廣式大墓的另一個時代開始。

第五章

晚清至民國墓葬

香港開埠之後，首先發展起來的是港島地區，而廣大的新界地區，一直到光緒末年（1898）才正式納入港英政府的管轄，因此這時期的墓葬，香港島和新界的墓葬風格逐漸分流：港島區因廣府地區移民數量迅速增加，因此受廣府晚清風格影響很明顯，大規模使用石質、奢華精美成為主流。新界地區則相對保守，原有的青磚式墓葬仍然流行。

為了敘述方便，本書將道光朝整個歸入開埠之前的墓葬討論，這是因為雖然香港開埠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不過在開埠初年，英國只佔有香港島，而香港島上的早期移民，尤其是有一定身分地位的居民，都不在本地安葬，所以道光朝新界地區現存古墓較多。

咸豐朝（1851—1861）只有十一年，香港地區現存本朝文物稀少，中國內地，因爆發太平天國運動，經濟受到摧殘，咸豐朝款的建築、器物等均屬稀缺。此時期的香港，港島已劃入英國管治，但草創之初，各種制度未健全。華人禮制不消說當然遵依傳統，廣府商人講究落葉歸根，來到此地的廣府新移民多數是底層勞工，這些勞工即使病逝，也多數運柩回鄉安葬，因此港島區迄今未發現咸豐朝的墓碑。

新界地區，現存咸豐墓尚有數處，較典型的當數桂角山腰的鄧春台母子合墓。桂角山在元朗，因山上少樹木、多巖石，原名圭角山，本地人多因諧音為雞公山或雞公嶺。鄧春台墓位於南坡西坑嶺 100 米等高線上，由於位置偏僻，保存較完整。

墓為青磚山手式墓，由護嶺，



桂角山鄧春台母子墓外觀，官帽頂的裝飾風格猶存古風

壘環，拜台組成，未發現后土。護嶺與壘環均為青磚砌成，無雲月浮雕，壘環與護嶺青磚為人字形砌作，墓碑框為花崗巖石質，碑框上方有官帽形寶珠，塗紅色，墓碑為黑石質，楷書，保存完好，正中為「清例授八品孺人鄧母侯氏，邑庠生顯考春台鄧公墓」。按照右側的銘文，侯氏為鄧元璧的原配夫人，生二子，鄧春台是她的次子，生於道光二年（1822），卒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得年僅二十四歲。因此其父親將幼子和夫人合葬於此，土名屏莆。墓碑年款為「咸豐五年乙卯」（1855）。掛榜和踢靴亦以青磚砌成，磚為橫直砌作，這種造型和砌法，與道光朝的實物如「荷葉跋龜」一脈相承。鄧春台墓為母子合墓，這種合葬方式在香港現存古墓中較罕見。



鄧春台墓碑銘文

鄧春台母子墓因位置在高山上，地形的高聳和偏僻使其得以完整保存。值得注意的是，從前述的明代「將軍下馬三杯酒」，到康熙朝的「五點梅花」，乾隆朝的「五龍爭珠」等，都在地形較高的位置點穴，不過咸豐初年之後，晚清新界大族就很少再在偏僻的高山上營造大墓，轉而流行在較為平易到達的低地安葬。

由嘉慶朝開始流行的橫直混合式青磚砌法，在道光、咸豐兩朝開始成熟，康熙到嘉慶朝的實例（如天光莆廖仲傑墓與四排石鄧柱我墓）均有青磚與黃色磚的混合，黃色佔很小的比例，到了道光、咸豐兩朝，基

本已是一色青磚。沙田九肚山可見到一處有趣的實例，這是一穴石砌混合青磚的山手墓，原來的形式為一重護嶺加壟環式，咸豐四年（1854）重修時，將護嶺和掛榜改為青磚，墓碑為火山石質，正中書「十七世祖考興隆鍾公墓」及夫人名諱，左側記載墓地土名「馬尿」，左側年款為「咸豐四年仲冬月吉旦重修」。從護嶺與踢靴部分看，是以當地所產紅黑色石塊所砌成，這種形制與前述乾隆年間做法非常接近。壟環的青磚為人字形，掛榜為橫直砌作，則屬後期的手法。

上述碑石並非清早期的黑色石，而是火山石，前述道光朝開始，墓碑的質地開始多樣化，而咸豐朝更出現了陶質刀刻銘文的墓碑，較為早期的一例，是在曹公潭上花山村後山的曾維俊墓，此墓形制簡樸，只是簡單的草墳，特別的是墓碑為陶質碑，質地較硬，看來經高溫處理過，歷經多年仍然完好。這種墓碑的做法，是趁陶泥未乾時，以刀或者竹籤將銘文刻上，再入窯燒製。右側銘文為「皇清咸豐歲次乙卯年仲冬月」（1855），這種墓碑在其後各朝均有出現，多用於普通人家的草穴，這是



沙田九肚山咸豐四年重修鍾公墓，本地石築改青磚砌作



咸豐五年陶質刻字墓碑

較早的實例。

咸豐朝的古墓，較值得一提的是這時期開始，香港的古墓開始有歷史留影出現。攝影術約在道光中期（1830年前後）開始在中國留下最早影像，迄今所見最早期的香港照片中，有一張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英軍在九龍半島的軍營留影。



1861年在英軍九龍半島的營寨外可見廣式墓葬

影。照片中可見，在軍營附近有不少較大型的砂手式墓，放大後可見，這些砂手墓由護嶺、壟環、月池三部分組成，與今日新界所見並無太大不同。由於這些墓地在當時均屬新近建築，因此塗上了醒目的白色灰水，在黑白照片中非常顯眼。

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九，公曆為1861年1月19日，英軍在九龍舉行了登陸儀式，正式從中國官員手裏接收九龍半島，並張貼佈告，宣示九龍半島與昂船洲為永久租借的英國管轄土地，以上的歷史照片，就是這一時期為歷史存檔所拍攝。從照片中可以看到，當時九龍半島的山地和坡地上，不少規模頗大的中國人墓穴星羅棋布，不過今日由於近代戰亂和城市建設的緣故，在九龍一帶幾乎找不到這種青磚大墓了。與此同時，隨着同治、光緒兩朝時代的開啟，廣式大墓走進了一個全盛時期。

同光兩朝（1862—1908）廣式墓的高峯有其時代背景。首先是同治到光緒的近半世紀是近代廣東和香港的黃金年代，尤其是香港，隨着經濟的騰飛，人口從僅超過十萬發展到四十餘萬。¹這一時期香港通過

1 據香港地方志中心網站資料，引用香港政府人口普查數字，1861年人口數約為11萬人，1908年人口數為42萬人。



《香港華字日報》1901年9月登載的消息，說朝廷有意停止捐納官銜，請港商趁早辦理

各種立法、招商，成功成為遠東的國際口岸和自由港，吸引了各國商人和其他知識界人士來此定居，其中華人佔了多數，且以廣府地區為主。

其次是同治年間開始，因為清政府每年有大筆軍費開支，以應付鎮壓太平天國等的開銷，不得不想出了「買官捐官」的方法。清初禮制森嚴，對於官員的品級和對應的封銜，有嚴格的規定，不能隨便授予，尤其是雍正、乾隆朝，皇帝對此三令五申，文士非讀書應考，不能輕易獲得功名，武將要獲得「將軍」之類的頭銜，更是難上加難。但到了咸

豐和同治朝，這個規定被政府許可的買官制度所打破，普通平民可以通過「捐納」（即向清廷的戶部捐贈一筆費用）而獲得「執照」，按照捐納金額的多少獲得相應的官銜。

很多人不了解這種清末的捐官，因此將墓碑上的官銜看作真正的大官，此為大謬。清末雖然官多如牛毛，然而通過捐納所得的，只是「官銜」。按照清代的制度，文武官員在獲得實際的職務和品級之後，都能同時獲得相對應的官銜，例如正一品的加銜為光祿大夫，從一品的加銜為榮祿大夫，正七品的加銜為文林郎，從七品的加銜為徵仕郎等。舉例說，張三實授東莞縣知事（即知縣），他就同時獲得文林郎的官銜；而同時期的李四，他只是通過捐納向戶部買了執照，獲得文林郎的官銜，但是並沒有任何實際的官職。李四只能夠擁有文林郎的虛銜，他的好處

是能夠自己做一套七品官的官服和補子，頭上也能帶七品的頂珠，並且在見到當地的地方官時，可以不行跪拜禮（因為大家品級相當）而代之以平輩相見之禮等等。

清末的捐官，在整個社會形成一種風氣，即互相攀比、炫耀，此前的禮制規矩全然敗壞。例如嘉慶，道光時期，洋商最高也只能獲得三品的官銜，即使富豪如怡和行的伍崇曜，也只擁有三品的水晶頂，而且在見總督時還不敢戴，以示謙遜。到了光緒朝，商人們爭相買官銜作為炫耀和社交的手段，曾經在香港生活多年的近代啟蒙學者王韜（1828—1897）曾經有這樣一段生動的描述：

港中風氣近日風氣一變，亦尚奢華。余初至時，為經紀者多着短後衣，天寒外服亦僅大布。嗣後日漸富侈，自創設「東華醫院」以來，董事於每年春首必行團拜禮，朝珠蟒服，競耀頭銜，冠裳踴擠，一時稱盛，而往時樸素之風縵矣。熱鬧場中，一席之費多至數十金，燈火連宵，笙歌徹夜，繁華幾過於珠江，此亦時會使然與？²

這裏王韜描述了他在同治初年來香港時「樸素」的風氣與光緒初的奢華作了比較。東華醫院於同治九年（1870）成立，是香港第一個高等華人主持的組織，因此其總理董事，也由高級華人買辦商人擔任，這些有頭有臉的人物，雖然坐擁舉世，卻需要官服和頂子的加持，才能在當時吃得開。官方廣開捐納之門，自然令他們如坐春風，團拜會就成了互相炫耀的好機會。表現在其他禮儀方面，喪葬時的排場，必然也要與官銜相配，墓葬上更不例外。

2 王韜：〈香海羈蹤〉，《香港紀要：近代文獻著作選》（香港：三聯書店，2020年）。

王韜在文章中特別點出香港的豪奢，幾乎可與「珠江」相比。珠江指代省城廣州，廣州的豪奢，在清代是赫赫有名的，香港在同治初年，已經能與之相比，可見廣州的生活方式是如何深入地影響香港，墓葬只是其中的一環而已。

廣州是整個廣府的中心城市，廣州的生活方式，是整個廣府地區甚至華南的參照，包括飲食、娛樂、建築、紅白禮制等，廣式墓葬的集中地為廣州城外的白雲山，若觀察一下白雲山的墓葬，九成以上均為同治、光緒兩朝所營葬或者重修，有趣的是，白雲山上的墓葬幾乎看不到青磚立面的實例，而是大量使用石砌以顯示奢華。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港島區：港島現時未發現有青磚立面的大墓，卻擁有大量石砌的晚清與民國初年墓葬，這兩者之間的微妙相似絕非偶然。

香港島上現存最早的有年款的墓碑，除了上引柏架山上曾貫萬營造的曾氏福德公墓，還有西環堅尼地城一帶山坡上的幾座義冢。義冢可說是香港移民史上的特殊產物，也是組成香港歷史的小人物的歸宿。

香港開埠初年，港島迅速吸引了大量的外地人居住，來自廣東和福建一帶的底層居民，多住在太平山街（今上環至西環及堅尼地城）一帶，生活條件惡劣。港島多山、蚊蟲肆虐，曾經引發多次瘟疫、鼠疫等，這些身無長物的勞工和妓女，不能像較富有階層那樣在身故之後，能夠歸葬鄉下，很多就是在西環附近的山坡上隨便埋葬。

同治八年（1869），港督麥當勞（1814—1879）在寓港華僑的請求和英國政府的授意下，同意在上環撥出土地，興建一所面向華人的醫院，即東華醫院。同年在動工興建時，在西環一帶山坡陸續發現不少骸骨，這些應該都屬於開埠初年的下層移民，由於當時草草埋葬，無名無姓，也無人認領。東華醫院遂在摩星嶺一帶將這些白骨重新安葬，並建了幾

座大小不一的墓葬。

現存較早期的，如西環士美菲路山坡上的一座「先人白骨之墓」，規模較小且簡樸，只有一方白花崗巖石質墓碑，款為：「先人白骨之塚，同治八年由太平山遷此，東華院立」。東華醫院在草創之初，就訂立贈棺施藥為其業務之一，並在後來開設著名的「東華義莊」，因此在醫院還沒有落成之時，東華便已經施行善舉。另一座較大規模的同期義冢則坐落在士美菲路觀龍樓下的土坡中，這座墓屬於港島區最早期的近代廣式大墓形制之一，為花崗巖砌砂手墓，雖然失祭已久，仍然能看出昔日的工藝。墓地由兩重護嶺和壟環、拜台、月池組成，今日拜台和月池已經淹沒在瓦礫和亂草中，只能辨認出護嶺和壟環。壟環內壁由人字形青磚砌成，但是都塗上了一層厚厚的灰砂，因此外觀上幾乎看不出青磚，青磚上裝飾以花崗巖石條。碑龕分兩部分，碑身為方框連碑，行書「義塚」兩個大字，碑額則為祥雲湧月浮雕，已跌落壟環內，手工精美。這



西環山坡上同治八年東華醫院所立墓碑，簡樸而無裝飾



西環觀龍樓山坡下的同治年間所建義塚，今日已經瀕危，從灰砂後可見青磚人字形砌作痕跡

座義冢已失祭，但由於靠近觀龍樓，時常有街坊路過拜祭。較有意義的是，此墓在壟環的砌作上，仍然保存了人字形的磚砌方式，但是被隱藏在灰砂之內，不再以青磚作為裝飾。大量使用花崗巖的裝飾手法則已屬廣州風格，顯示當時工匠在轉型期的混合審美趣味。

摩星嶺一帶義冢羣很多在上世紀中葉已經遷到其他墳場，現存的同治朝遺構還有香邑三山義冢一座，這座墓經後代重修，只有碑框保留原貌，為一花崗巖石質的大碑，碑身與框同一石鑿成，上方為精美的祥雲湧月圖案，並有「福祿壽」三字行書，正中為「香邑」、「三山」、「義塚」楷書，兩旁款為「同治壬申年」、「聯義堂值事等立」，此墓碑風格正是廣府流行的新風尚，與新界保守的材質大異其趣。筆者查閱各網站上的記錄，均說此「香邑」、「三山」是指香山與潮州兩處勞工在美國亡故之後，由東華醫院收殮安葬於此。此則因未解「三山」一詞所致。因香港有數所潮州客家共祀的「三山國王廟」，因此網友誤認為三山指潮州。實際上，香山屬廣州府，與潮州府為兩回事，且廣府與潮屬語言習慣，生活

方式大異其趣，不論善堂如何安排，斷無將兩府人合葬之理。再查落款「聯義堂」，乃晚清香山籍人士之幫會社團，主要為香山三灶人，從此墓下方重修落款的「三灶公房」與「安瀾軒」更可確定，此「三山」乃指香山三灶，即今日珠海三灶地區而已。

同屬摩星嶺一帶現已遷葬的同治至光緒年間大墓，還有現存粉嶺和合石公墓內的「遭風義塚」，同治十三年甲戌



摩星嶺香邑三山義塚，同治壬申年（1872）立

（1874）九月，香港遭遇了一次嚴重的颱風，這是香港首次有記錄的重大風災，事後剛成立的東華醫院帶頭收殮了百多具遇難屍體，並安葬在摩星嶺後的雞籠環墳場。這是一座廣府新式的墓碑，為一座三聯式的碑石，碑框高大，正中的碑石連碑額為一整塊花崗巖石鑿成，碑額為浮雕祥雲湧月圖，碑文正中為「遭風義塚」，兩側落款顯示這是光緒六年庚辰（1880）遷葬時由東華醫院所立。兩側為一副花崗巖石質的對聯，文為「澤及枯骨，正其首邱」，對聯上方各雕刻蝙蝠銜金錢圖案，這種圖案與道光之後，廣府地區寺廟對聯裝飾手法是一致的。

在新界地區，同治朝仍然屬於清廷管轄，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由官方所修築的墓多屬花崗巖式墓碑與墓式，而原居民的墓葬仍然保持保守的黑石碑風格。具體實例如將軍澳「佛頭洲義塚」與屯門青龍頭「皇清待旌貞女墓」（詳後文介紹），兩例均為當時駐守當地的軍官所立，材質與形制均屬新廣府式。原居民的墓葬，如大欖圓墩的同治甲戌鍾氏夫婦墓，仍屬青磚壟環加護嶺的人字磚加橫直砌作形式。

同治朝的古墓中，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在九龍半島茶果嶺上的一座灰砂墓，墓主為葉拔禮，這座墓為灰砂砌砂手墓，由一重護嶺與壟環，拜台組成，未見月池。墓的砌法是以石塊砌外壁，再以灰砂塗飾，壟環砂手以石鼓形裝飾，全墓佔地約二十平方米左右，並不算奢華，然而其特別指之處，則在墓左右兩側，距離墓地約8米左右，各有一對花崗巖石質的旗杆夾石，這是清末流行的一種用於炫耀子孫功名的裝飾，原來只用於宗祠前面，到了清



皇清待旌貞女墓，青龍頭後山同治九年所立

代同治年間開始，又流行於祖墓前作裝飾。清代香港地區功名極稀少，只出了一兩個文武科的進士以及少量的舉人，這對旗杆夾從尺寸和銘文看，屬於舉人功名的旗杆石。此墓的墓主為葉拔禮，墓碑上顯示其身分為「儒林郎」，墓碑上刻為同治四年乙丑（1865）重修。按照清制為從六品官，這對旗杆石是香港目前發現唯一的一例用於墓葬前的功名旗杆夾石（詳見後文），葉拔禮墓已經遷走，但旗杆夾石保存尚屬完好，具有特別的價值。

光緒朝（1875—1908）是近代史上很重要的時期，整個中國社會加快了從古代社會模式逐步蛻變為近代社會的過程。對廣東與香港而言，光緒朝是一個光輝的黃金時期，此時期香港迅速成長為亞洲重要口岸城市，廣州的經濟文化也與香港彼此呼應，兩城之間的商貿活動頻繁，人員往來愈加密切，香港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上越多地參考廣州模式。體現在禮制方面，新興的商人階層越來越多地希望提高自身的社會地位，通過捐納官職和頂戴，提升自己在社會上受尊崇的程度，廣州新興起的奢華和炫耀之風，在墓葬上亦有反應。



茶果嶺葉拔禮墓兩側各有一對旗杆夾石



同治四年葉拔禮墓碑

前面曾經介紹過，香港島的居民構成，在道光至同治朝，均以廣府地區移民為主，這些廣府人若不幸病故，富有階層多數選擇回鄉安葬，無錢的窮人才會在港島西環一帶山邊草草埋葬。雖然早在 1845 年，香港政府已經開闢了今日跑馬地後山的殖民地墳場（今日香港墳場），但主要是供歐洲和基督徒安葬。華人的葬地則仍然放任自流，富有之家若選擇在港島下葬，請風水師勘定吉地之後，再向私人業主購買或者自擇無主山地，或者向政府購買地權。但由於習俗關係，港島區華人大墓並不多見，光緒年間，陳曉雲所著《香港雜記》中有一段對摩星嶺一帶墳墓的記載：

兩山相對，其一是摩星嶺，其一是域多厘山，唐人之寄葬者，墳墓在摩星嶺之北，唐人之入教者，墳墓在摩星嶺之南。³

這段文字中，作者特別用了「寄葬」這個字，以示區別於入教（指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華人的永久安葬，唐人多數以暫時安放的形式在這一帶營造墓穴。所以港島光緒朝的華人大墓，主要以義冢為大宗，港島區規模較大的首推現存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中的「南邑先友墓」。南邑即廣州府屬南海，這是廣州府屬下最富庶的縣之一，清代廣州最富庶的，首推「南番（番禺）順（德）」而以「南」居首，可見南海地位之重。這座義冢安葬南海籍的窮人骸骨，是一座典型的晚清廣式砂手大墓，由后土、兩重護嶺、壟環、拜台和月池組成。整座均用港島所產白色花崗巖石砌成，用料考究，選材光滑，打磨工整。此墓建造時間，比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還早，後靠堅實，遠眺南丫島海景，氣勢不凡。

3 陳曉雲：《香港雜記》（香港：三聯書店，2018年），頁58。



在光緒末年造價高達三千港元的南海義塚，位於香港仔華永墳場

這座大墓融合了很多光緒朝廣式大墓的特點，例如開始出現中西結合的元素，如碑框的裝飾，是一組螺旋式上升的旋紋，墓碑上用地球形的裝飾也凸顯了西方元素。墓碑文字為：「南邑先友之墓，本山座艮向坤兼丑未之原，光緒二十年吉日福仁堂立」。

考福仁堂為南海商會所設的管理機構，此墓由世界各地南海同鄉會所籌款建成，當年光是善款就捐資多達港幣五千圓，購買山地和建設用去三千多圓，餘下的則用作投資生息，供拜祭之用，1917年港府開華人永遠墳場，剛好此墓在墳場範圍之內，得以永久保存。⁴ 此墓的另一重要價值，則在於其造價在南海商會記錄中得以保留，三千港元今日看來似乎不值一提，若參考一下，光緒末年至宣統初年，尖沙咀一帶一座

4 佛山市政協文史委編：《旅港南海商會資料專輯》（佛山：佛山市政協文史委，1990年），頁134。



南海義塚的全石砌結構，顯示了光緒朝廣州傳來的新風格在香港已經流行



掃桿埔台山李氏墓砂手石獅子

連地皮的三層唐樓（樓下為商鋪，樓上為兩層住宅）市價約合九百港元，則這座大墓買地連造價，可買三幢房屋，可知當時高級陰宅之昂貴！

南邑先友墓作為現存港島區華人義塚中規模最大的一座，其工藝價值也頗高，壘環和踢靴轉角均有廣式石獅一對，踢靴位置的一對石獅與台座為整座雕成，又有一對石鼓立在拜台兩側，拜台為兩重，外拜台的台階兩側亦有小抱鼓裝飾，這是廣式近代建築的特點：凡是台階兩側裝飾以小抱鼓者，均屬先人所居（祠堂或者陰宅）。

港島區也有一些較大的華人私人墳墓，其中以大坑跑馬地後山掃桿埔山坑中的李母謝夫人墓為典型。這座古墓已失祭，位於著名的馬場先友之墓山路旁，為鐵絲網所擋住，一般不容易發現。這是一座典型的廣式石砌砂手墓，由護嶺、壘環、拜台、月池等組成，由於山泥傾瀉，大部分已經倒塌，未發現是否有后土及敕書亭。護嶺及壘環，砂手均用本地花崗巖石砌成，手工精湛，碑龕與碑為整座花崗巖石質，上有祥雲湧月裝飾，碑文為宋體字：「寧邑貽贈孺人庶妣李母謝氏之墓，光緒二十七年歲次辛丑孟夏吉日」，這裏的寧邑即新寧，台山的古稱，「貽贈」意思是本身的封銜移贈給父母，孺人為清代七品官夫人的例贈銜，台山



掃桿埔台山李氏大墓墓碑，年款為光緒二十七年

李氏在清末曾經出現不少富商之家，這位謝夫人不知為誰家庶母，掛榜位置為兩龕位，中間各鑲嵌行書「福壽」字石刻，書法挺秀。砂手亦由石砌，兩側各有一頭石獅子裝飾，這是港島現存廣府華人墓中較有價值的一處，可惜在失祭和山泥傾瀉之下已經瀕危。

港島區清末廣式大墓最集中的，則是摩星嶺「昭遠墳場」和毗鄰的何莊。

昭遠墳場在 1897 年由港府批出 38 萬英呎土地，供香港的「歐亞混血社區」安葬先人，較早期下葬的人士中，卻有一些是華人，這些人之所以獲得在此下葬，是因為嫁給歐洲人或者是歐裔人的庶母等。這片土地開發較早，又是由富庶的歐亞混血社團管理，因此成為研究清末廣式大墓的最佳集中地之一。

昭遠墳場較早下葬的大墓，都與光緒年間香港幾個大富商家族有關，最顯赫的當數何東（1862—1956）的母親施娣的墓，這也是整座昭遠墳場中建成年份最早的一座，建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這座墓為典型的廣式大墓，依次由后土、敕書亭、兩重護嶺、壟環、拜台、月池、一對華表等組成，墓旁還有石砌桌椅等附屬石器。但墓並非全由石砌成，而是在護嶺、壟環的封邊使用花崗巖石，兩重壟環正中分別為五福捧祥雲湧月、蝙蝠雲月紋裝飾，碑龕為花崗巖石質，碑額雕刻雙鳳銜雲月紋，雕工生動。碑龕兩側為羅馬柱形，又顯出墓主的特殊身分。墓碑則為連州青石質，這是光緒年間才開始興起的一種來自粵西地區的名貴石材，顏色帶碧玉的青色，石質細膩。何太夫人墓是現存香港古墓中

使用連州青石較早的實例。

墓碑上刻「皇清誥封通奉大夫顯考仕文何府君 誥封二品夫人顯妣施氏太夫人之墓，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吉日」，左側為何東、何棠等四兄弟和兒孫的名款。這墓中其實只有何東的母親施太夫人，而那位受到「皇清誥封」從二品通奉大夫的「仕文何府君」（Charles Henri Maurice Bosman，1839—1892）乃是一位荷蘭猶太人，即何東的生父，他在香港與寶安籍的施氏生下何東之後，即回到英國，並且從此沒有回到香港。何東為了孝順施氏，為母親捐了二品（這是清末商人能夠捐納到的最高品級）夫人，當然同時也使那位遠在英國從來沒有穿過官服補子的猶太父親也得到了一個清國大夫的官銜。壟環兩側各有石獅一頭，蹲坐在方形石座之上，拜台兩側也各有一對花崗巖石獅，高 1.5 米，形態威嚴。

施太夫人墓的重要性，不僅在墓的規模本身，這裏有兩處文物不可



昭遠墳場最大型的何東母親施太夫人墓及其後兩重護嶺與石雕



何東父母墓碑，採用連州青石質，是目前所見最早使用此種名貴石材的墓碑之一



施太夫人墓前一對華表上，刻有何東的官銜

小覷，其一是墓前的一對華表，這是港島區唯一的一對古代墓前豎立的華表，華表上有銘文「賞戴花翎銜候選道何啟東」，因為清代制度，要在墓前豎立華表，必須子孫有官銜（品級有限制，但清末多數鬆弛），何啟東即何東的官場用名。這對華表由三段花崗巖石組成，上方各雕一頭對望的石獅子。

另一處則為兩重護嶺的後方，豎立了兩方花崗巖雕成的廡殿頂式碑，右側為后土之神，左側為敕書亭，這是同治、光緒朝才興起的一種新的儀仗，其用途為炫耀墓主的顯赫。上面刻「奉天誥命」四字，意思是墓主曾經受到朝廷的誥封。奉字在右側，天字（代表皇帝）抬頭在正中，廡殿頂裝飾類似乾隆朝的墓碑框裝飾，作瓦筒滴水型，所不同的是，正中刻一小豎牌匾，上面為篆書「恩榮」兩字。這種亭子源自廣州，稱為「敕書亭」，施太夫人的敕書亭是香港現存最早的一例。

昭遠墳場現存光緒年大墓尚有不少，形制均屬廣府新式，手工亦為廣式做工。如洗母黃太宜人墓，建成於光緒戊戌（1898）七月，即墳場建成第二年，為三重砂手墓。後方為一座敕書亭與后土碑，並設有兩重護嶺，均為灰砂砌作，正中裝飾有蝙蝠銜祥雲湧月圖案，墓碑為白色花崗巖石，款書：洗母黃太宜人墓，光緒戊戌秋七月吉旦立石。按「洗」即洗姓氏的古寫，墓主為富商洗德芬的母親黃氏夫人，因洗德芬（1856—1925）為歐亞混血兒，其母親也因此得以安葬於此。墓碑額為五雲裝飾，簡潔莊嚴，壘環和拜台均以花崗巖石鋪地，壘環前石條為兩

條花崗巖石拼接，接縫處安排在墓碑右側，以免衝撞碑身，這也是廣東祠廟建築的特色之一。敕書亭在墓後方，為一座廡殿式碑，頂部為鰲魚一對與寶珠，文字與施太夫人墓相同。洗母的封贈為五品宜人，按清代制度，五品及以上者，可獲贈誥封，五品以下則只獲「敕命」，因此黃宜人墓能豎立「誥命」敕書亭。順帶一提的是，五品以下文字為「奉天敕命」，其尺寸也較誥命為小。

另一位歐亞混血富商陳啟明（1859—1919）的母親林宜人墓建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其手工較施太夫人墓更形精美，這是一座兩重護嶺的大墓，特別之處是每重護嶺均延伸出砂手，這樣更顯得氣派非凡，這種砌法在廣州目前發現的實例均在光緒朝才開始出現，而香港隨即跟上。此墓護嶺與壘環以水泥作牆身，這是當時較新式的建築材料，所有轉角及邊沿位置均為花崗巖石質，各層之間又以抱鼓型牙子石支撐及裝飾，錯落有致且凸顯線條變化豐富。兩重護嶺正中為連州青石碑額，浮雕蝙蝠銜祥雲湧月圖案，碑身與碑額為一整塊連州青石雕成，碑額為雙鳳銜雲月圖案，碑文為：「皇清顯妣陳母林氏宜人之墓，光緒二十七年三月吉日」，以及子孫題名字樣。墓後方與洗宜人墓一樣，有后土與誥命碑各一方。墓前有石鼓兩對，上浮雕丹鳳圖案，並有石桌椅兩對，壘環及拜台、月池均以花崗巖石鋪砌。此墓造價應與南海先友墓相當，在光緒末年屬於豪宅級別。

港島區也不乏草根階層的光緒時期小墓，能從另一側面反映當時的生活狀態，其中摩星嶺與堅尼地城附近有數處鼠疫墳場，記錄了光緒



洗母黃太宜人墓，兩重護嶺，注意其後設有敕書亭及后土碑各一座



陳母林宜人墓的繁瑣石雕裝飾羣，造價不菲



陳母林宜人墓，兩重護嶺及其後救書亭，后土碑，墓碑為連州青石

二十年（1894）前後香港爆發鼠疫的歷史。當時每日均有人因染疫過世，為防止感染，港府規定凡屬鼠疫死亡者必須安葬在指定的區域內，俗稱鼠疫墳場。1897年，政府憲報上專門刊登了這項規定並且列明安葬範圍，主要在今日堅尼地城靠近摩星嶺一帶。

因鼠疫地區多數在太平山街一帶的貧民區，死者均為貧苦大眾，這些鼠疫墳墓規模都很小，絕大多數只有一塊小方形的墓碑，上面書阿拉伯數字的編號，有一些帶有光緒年款及簡單的墓主名字，有一些連名字都沒有，則寫「無名氏」。今日這些墳墓多數已經淹沒，筆者往採訪時，只見到被鋪作台階或者丟棄在一旁的樹下，雖然有文保愛好者倡議，但因該地價高昂，政府並無保育的打算。這些草根階層的小墓碑與近在咫尺的奢華大墓，正好是光緒朝貧富差距的縮影和見證。

九龍半島的光緒大墓，規模稍大的，多屬義塚，如飛鵝山下的九龍樂善堂義塚，屬於九龍半島較罕見的大型古墓。樂善堂創建建於道光年

間，是九龍城地區歷史悠久的慈善團體，這處義塚營建於光緒甲午，由一重護嶺和壟環、掛榜、踢靴、拜台、月池組成。相比起富裕的南海、香山，樂善堂的義塚顯得較為簡樸，僅由灰砂砌作，無雲月裝飾，墓碑與碑框為花崗巖石質，正中為「樂善堂義塚」行書大字，兩側落款為「光緒歲次甲午季春吉旦立，江西鄒玉堂點穴」，除墓碑雕刻厚重外，全墓均樸實無華，顯示了樂善堂的務實風格。

有趣的是，新界地區的光緒朝墓數量眾多，不過論規模和手工，卻少有能與港島的富商比肩的。並且九龍和新界區的光緒宣統墓，凡墓主是本土人士者，仍然保持青磚砌墓的保守方式，並沒有跟上廣府新的石砌墓風氣，甚至到今日猶然。

光緒朝新界的墓葬，仍然沿襲此前的舊式青磚砌作法，不過尚有數例值得一提，屬於青磚砌作的「加強版」，較突出的數元朗新田洲頭村後山的「渴馬飲泉」。這座墓的規模頗為壯觀，由一重護嶺及壟環、掛榜、兩重踢靴、拜台、兩重月池組成。其中護嶺與壟環、兩重踢靴均為



公民村舊址的石台階，均為昔日鼠疫墳場的貧民墓碑所堆成，上面簡單刻有編號和姓名籍貫



井欄樹村樂善堂義塚，光緒甲午年（1895）建，上有江西地師名款

青磚砌作，其高度與眾不同，壟環內青磚高度近兩米，站立在墓碑前，四周的青磚仿佛置身房屋之內。壟環與護嶺為人字形砌作，其餘作橫直砌。護嶺正中以紅色灰砂浮雕出祥雲湧月圖案，壟環欄口以花崗巖石兩道豎砌裝飾，氣氛莊嚴。

與壟環的高聳青磚形成對比的是，此墓碑顯得低矮，高僅為一米左右，青石質，正中楷書：「清敕授儒林郎，誥贈昭武都尉彥其莊公之墓」，右側為莊彥其的父母等世系，並註明此地喝名為「渴馬飲泉」，地師為羅浮山華首台方丈吾賓，左側年款為「光緒十二年二月初八」。莊氏世居黃崗鄉（今深圳皇崗），晚年獲取功名，因此得到八品的「儒林郎」敕命（如前所述，五品以下低級官員稱為敕命），但在他身故後，因子孫又獲得了「昭武都尉」的加銜，因此他又可以獲得子孫官銜的加贈。昭武都尉為清代正四品的封贈，因此可以獲得「誥命」，清代制度規定，生前獲得的封稱為「授」，死後獲得的封稱為「贈」，從墓碑上並列兩行可知，莊其彥在生前獲得「敕授」文官八品儒林郎，過世後以子孫的封銜（很可能為捐納，因武官捐納較文官便宜一半以上）又獲得「誥贈」武



莊彥其墓「渴馬飲泉」，高聳的護嶺與壟環高度為新界之最



莊彥其墓正面全圖，壟環與站立之人顯出誇張的高度比例

官昭武都尉。這方墓碑上文武封銜並列，顯示了清末官制鬆弛的有趣現象。而高聳的青磚，則折射出清末在寶安東莞地區，原居民的審美仍然維持清中期以來的青磚造墓形制，但是在廣州奢侈之風的影響下，他們也試圖通過擴大青磚的尺寸、規模，達至炫耀家族權勢的目的，墓碑上的加銜正好反應了這種心態。墓兩側的踢靴多至兩重，高度也近兩米，月池兩重的造法在新界極為罕見。第一重月池與而踢靴之間，有兩道灰砂砌抱鼓型牙子作為裝飾，這種手法也繼承了清中期的傳統。

其餘散佈在新界各處的光緒朝墓，雖然數量眾多，但較少有特色，甚至有一些仍然保持了青磚加黑石碑的古老遺風，這說明了新界原居民對傳統的固守。

光緒、宣統之際，香港華人大墓開始出現一些屬於本土風格的萌芽，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說明香港因經濟的起飛，文化上逐漸出現了個性，與廣州的審美產生了異化，前述昭遠墳場中，何仕文墓的碑龕裝飾用羅馬柱即為較明顯的實例，到了光緒末年和宣統年間，這些西方元素愈加明顯。

昭遠墳場中，何東的岳母墓，即光緒三十年甲辰營造的「麥母吳孺人墓」規模較大，由兩方后土來龍碑、一重護嶺及墓誌銘碑、壟環、拜台、掛榜、一對石獅、一對石鼓及月池組成，除護嶺與壟環內壁之外，全為花崗巖石雕成，氣派奢華。壟環正中，是一道廡殿頂的墓誌銘碑，碑框為花崗巖石質，碑文為白色大理石，墓誌銘作楷書，字體描金。這種將墓誌銘或者誥命鑄刻在廡殿頂碑文中的做法，源自同治、光緒年間的廣州，因誥命的頒發較普及，得到誥封的人家往往將誥命原文也刻在墓後。但是白色大理石則是香港的特色，在清末廣州大墓中，未見有此類泊來的材質。此墓的特點在於墓碑和碑龕更加中西合璧，碑龕是由兩



昭遠墳場麥母吳孺人墓，使用了歐洲大理石作墓誌銘文



麥母吳孺人墓全貌，使用大量精美石雕

根羅馬柱支撐，然而柱礎卻是典型的晚清廣州花籃形。碑額為蝙蝠銜祥雲湧月紋樣，碑身鑲嵌深度較大，與何仕文墓碑相比，已經出現了內凹較明顯的傾向，這種形制可視作後來香港流行的圓柱加上半圓拱頂墓亭的濫觴。此墓碑為連州青石質，雕琢精緻，上方為三個篆書「壽」字，正中字體為宋體楷書「皇清例贈孺人麥母吳氏之墓」，兩側有生卒年及何東重修的年款。「例贈」即「應贈而未贈」，墓主為何東夫人麥秀英的母親吳氏，吳氏本為一蠶家船女，與歐洲商人麥奇廉生下了女兒麥秀英，並許配給何東。吳氏出身低微，僅因女兒的關係「夠資格」獲得孺人的身分，然而因為她並未真正得到清廷的封誥，因此墓碑上只能用「例贈」而不像前述幾位鄰居一樣用「誥封」、「誥授」，其墓雖然顯赫，也未能配用敕書亭。此墓另一值得一提的是壟環外拜台的地面，為一整方花崗巖石雕成，不經拼接，在昭遠墳場中亦僅得一處。

吳氏墓旁的另一座同樣風格的碑龕，則是宣統二年（1910）的何門庶室周氏墓，此墓規模較吳氏小，碑龕形式幾乎完全一樣，亦為羅馬柱

加廣式花籃柱礎紋樣，碑身亦為連州青石，凹入較深。所不同的只在於碑額裝飾圖案略有差別，何氏與麥家為姻親，兩墓均為何東所經營，出自同一石廠。

宣統朝只有三年，其風格並無明顯差別，光緒末年至宣統朝，值得一記的則是華人墓也出現了西式的墓葬，多數集中在香港墳場（又稱殖民地墳場）。此墳場在香港公墓中，歷史最為悠久，在1841年已經有安葬的記錄。但由於此墓

必須安葬基督信仰者，因此直到光緒末年才有華人在此下葬，其中較為知名的則有孫中山的密友，興中會長楊衢雲（1861—1901），他因為參與革命黨的多次起義，被清廷殘酷暗殺於中環寓所，因早年奉教，家屬得在此墳場將其下葬。又因懼怕清廷破壞，墓碑上並無一字，只是豎立了斷裂的羅馬柱，象徵其志向未完成，碑身上則石雕出青天白日圖案。

香港墳場中還有極少數宣統三年前下葬的華人，如宣統元年下葬的潘門郭氏墓，梁少乾墓等，均以中英文標示墓主身分及生卒年，其中梁少乾年份為宣統元年，墓碑裝飾有浮雕十字架及百合花紋，碑上曾經有鑲嵌瓷相的痕跡，這是現存最早出現瓷相的墓碑之一，惜今相片已不存。

新界地區現存宣統墓亦有不少，多數為較小型砂手墓，以灰砂砌作，青磚的也偶有發現，但規模不大，如沙嶺岡背山的「丹鳳朝陽」袁氏墓等。墓碑質地有青石質、黑石質、火山巖石質等，字則多為宋體字。

香港最早的公共墳場，其實並不止今日香港墳場一處，在1845年左右，很多英國人及來華傳教人士因不適應香港潮濕多雨氣候，感染疫



宣統年間所立何門周氏墓，羅馬柱與廣式花籃柱礎毫無違和感



香港墳場內楊衢雲墓，基座上的廣式石雕圖案特別引人矚目



香港墳場內宣統年間梁健臣墓，以歐洲方式裝飾以百合花和十字架

症死亡，港府最早在當時還很荒蕪的下環日街、月街、星街一帶山邊建立過第一座公共墳場，這座墳場很快就不敷使用，而下環（今灣仔和金鐘一帶）又迅速成為居民區，因此政府陸續將這座墳場的墳墓遷出，並改到今日香港墳場集中安葬。

近年在金鐘和灣仔交界的萬茂台公園一角山邊，發現了一座碩果僅存的墓碑。這座墓碑為麻石質地，高約半米，上圓下方，左側尚可見「同治三年，x 公之墓」字樣。這塊墓碑傾斜地豎立在山邊，因有樹叢遮擋，很難發現，也因此躲過了多次遷移。

關於這座墓的主人很難考索，但是否屬於香港第一代墳場的子遺，則議論紛紛。有論者認為這不過是當年華人隨意安葬的一處痕跡，然而筆者從石碑的形制分析，當時華人在港島隨意安葬的，基本上都是廣東籍的低級勞工，他們的墓碑並不會使用西方慣用的上圓下方式，而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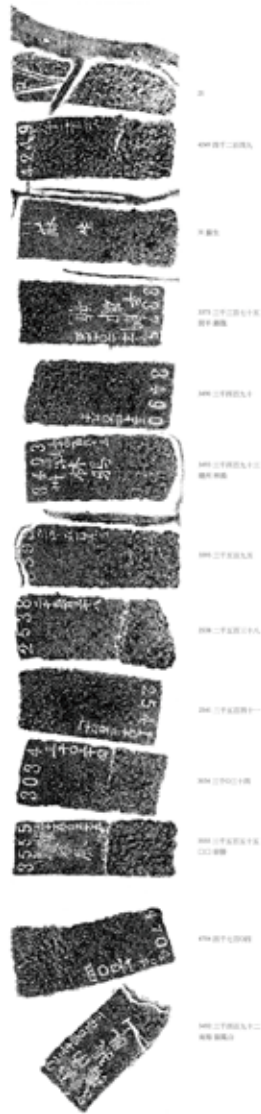
使用傳統的長方形墓碑。反觀今日香港墳場，上方半圓的墓碑佔了很大比例，只有奉教的華人才會接受這種碑式。早期港府的墳場，只接受歐美人士及奉教華人安葬，例如香港墳場迄今只有極少數華人能安葬，即是當年傳統的遺存。因此這方墓碑無疑就是當年第一代墳場的留痕。

辛亥之前，另一處接納華人的公眾墓地則是鼠疫墳場。發生在 1894 至 1895 年間的鼠疫，導致近 2000 人死亡，此後直至一九二〇年代末，香港每年都發現小規模的鼠疫，政府為減少傳染，規定鼠疫的亡者統一安葬到堅尼地城及附近的山坡上。

近年陸續在堅尼地城的山邊以及摩星嶺的潮州義塚附近，發現為數甚多的小型華人墓碑，這些墓碑高度都在 60 厘米左右，內容非常簡單，只有阿拉伯數字的編號加上亡者姓名，其編號可能來自於醫院或者收殮的名冊，亡者姓名前有簡單的籍貫，部分為無名氏。這些小型墓碑昔日遍布於堅尼地城延伸到雞籠環一帶的山坡上，因多年的失祭，加上附近建築木屋的建築大量被使用作堆砌擋土牆和石階等，今日倖存的墓碑已經為數很少，雞籠環的公屋工程更使殘存的墓碑被填埋，雖然不斷有環保組織，民間歷史關注人士甚至藝術家以作品呼籲，目前仍未看到政府有任何部門對此表示保護。



萬茂里山坡上最近發現僅存的一座同治三年款墓碑，從形制上看，應該屬於早期下環公共墓地的遺存



堅尼地城附近山邊台階昔日鼠疫墳場的墓碑被用作台階，藝術家朱樂庭創作的這組拓片呈現了黑白分明的視覺效果

從以上這幾座早期公墓看，辛亥之前，政府對於華人的墓葬並無限制，也許是因為在佔領香港時，英國已經承諾華人傳統的生活方式予以保留，而隨意選擇葬地，正是傳統生活方式的組成部分。所以政府的公墓只供信教華人使用，鼠疫墳場則是防疫的特殊情況，至於下層華人，就在港島眾多的山坡上隨意草草安葬了事，華籍富商是不會選擇在此長眠的。

辛亥革命對香港影響深遠，在廣東光復後，香港華僑歡呼奔走，日夜燃燒炮仗慶賀。但政局的變遷，並沒有馬上影響社會的禮制，尤其是素以保守著稱的喪事禮儀。

在民國初年，新廣式大墓在香港繼續流行，並且發揚光大，也衍生出本土的特有風格（如嵌有堂名的護牆等），更多的體現為大型的墳場中，廣式大墓爭奇鬥巧，以規模和手工互相炫耀家族的顯赫。

現存民國墓中，年款最早的有昭遠墳場中的張德輝墓。張德輝（1850—1892）是著名的商場連卡佛（Lane Crawford）家族的後人，同樣擁有歐亞混血身分。張德輝墓形制與前述麥秀英母親墓非常接近，由兩道后土碑、一重護嶺、壘環、拜台、掛榜、踢靴、月池等組成，全用花崗巖石雕砌，護嶺中為張德輝父親墓碑，壘環內則為張德輝夫婦碑，年款為民國元年壬子（1912）春，兩墓碑與碑龕裝飾手法與麥母吳夫人相同。月池旁的一對石鼓，作雄鷹與龍相戲弄圖案，較為特別。

民國初年，對香港社會而言，最大的改變，應該是出現了華人的永久墓



昭遠墳場內民國元年張德輝墓

園，這象徵着華人開始改變落葉歸根，歸葬故園的習俗。一方面，香港開埠已超過半世紀，不少來此旅居的華人已經居住多年，子孫繁衍，鄉土觀念已經改變。另一方面，因民國建立初年，國內各處戰亂，將棺柩等運送回鄉並不容易，且每年掃墓也是一個問題。

如前所述，早在 1856 年，港英政府就出台了針對華人的墓葬法例，即 1856 年的第 12 號法例，並於同年的《轅門報》即政府憲報上公佈於港島西端的摩星嶺和東面的黃泥涌谷設立華人墳場，法例中規定「下環以西地區華人於摩星嶺下葬，下環及以東地區華人限於黃泥涌谷下葬」，當年並沒有劃定摩星嶺墳場的具體範圍。而在 1892 年，港府又在掃桿埔後山開闢加路連墳場，後來又稱咖啡園墳場。這裏安葬的主要是民國初年到抗戰前的華人，但因為山勢較為陡峭，並沒有太多平地可以營造較大的墓穴，且遠望景觀欠奉，對 20 世紀初的香港華人富商並不吸引。

1913 年 6 月，由商人劉鑄伯等人向政府倡議開闢一片專供華人安葬的、無宗教背景的墳場，港府批出了在香港仔田灣的一片約佔地 7 萬平方米的土地，這裏背靠太平山，龍脈跌落堅實，前望鴨脷洲為案山，海水兩重，顧盼有情，風水甚佳，在光緒末年，這裏已有南海義塚等安葬。這是香港首座華人永久墳場，在開闢之初，就吸引了大批富商和名人選擇以此為長眠之地，因此這裏成為香港近代華人名墓與新廣式大墓最集中的處所。

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以下按香港習慣簡稱華永）除上述光緒年代的南海義塚之外，其餘均在民國年間下葬，在開闢之初，這裏的地塊有較多選擇，早期的大墓佔地頗廣，甚至有佔數層山地者，不過隨着香港人口迅速增加，從一九二〇年代開始，香港仔華永的墓地開始越來越擁



香港仔華永內記錄有劉鑄伯等商人籌建華永過程的一則墓誌銘

擠，甚至出現石獅子和砂手貼近前排的窘況。一方面墓主要顯示家族的顯赫，一方面土地的狹窄又使場面無法鋪張，只好在用料和手工方面儘可能花心思，這使得香港仔華永成為研究新廣式墓葬與石刻的絕佳示範。

在香港仔華永，可以看到很多此前未曾在香港出現的華人大墓的元素，例如墓道、牌坊、墓廬等，這些在內地明清大墓中經常可見的設施，以往因香港並沒有本土大紳，在新界也不曾出現。在香港仔華永，這些實例都可以找到，雖然規模略小，卻顯示出當年富商顯宦的氣派仍然不減。

墓道和牌坊，原來屬於大官和富商家才有的氣派，在香港仔華永，保存了「葉府墓道」的實例，以紅磚砌作的涼亭式墓道，結合了墓道牌坊與涼亭的用途，墓道前的一對廣式石獅更增添了墓道亭的氣派。紅磚牆顯示了濃厚的民國氣息，兩側牆上各開有八角形窗，窗格為鬥勾紋



香港仔華永的「葉府墓道」，結合了墓道和墓廬建築特點

樣，古樸方正。

牌坊的實例則為李葆葵墓旁的「萱闡日永」坊，李氏為清末新會富商李陞之姪，獲得清廷誥封二品銜，民國初年任農商部顧問。這座牌坊為單開間結構，兩柱冲天，柱間橫額為廡殿頂式，橫匾為連州青石質，正文為楷書「萱闡日永」大字，這是民國十一年（1922）大總統黎元洪頒賜給李葆葵母親七十三歲生日的贈禮。另外在富商高可寧的墓前，也有一座規模較小的牌坊，由區大原太史題寫，保存亦完整。

上世紀初開始營建的華永，其參照系當然以省城廣州為藍本，不過因地制宜，也出現了一些香港本地特有的元素，從形制上看，首先就是華永使用了獨有的「後屏」，即家族墓地後方的石砌擋土牆。古代墓地如同陽宅，土地四至範圍為私人所有，地權意識非常重要，因此才出現了土地界石。華永因地少且狹窄，不允許以界石分界，更不允許以圍牆分隔，而此地又是山坡，很多墓都是倚靠着坡地作為後靠，於是出現了



華永的高可寧墓牌坊，由區大原太史題寫



馮平山墓後屏上的岑光樾題字「始平瑩域」



華永周東生墓地後屏題字

將墓地後方山坡砌以石牆，並鑲嵌自家宅名的情況，這種界牆兼具護嶺與擋土的作用，在此前從未在香港出現，在廣州也沒有先例。

華永的石牆是很多參觀者印象深刻的特色，一些現存的石牆上自稱為「後屏」，蓋其形似屏風，也有蔭護後人的寓意。富貴之家的後牆，以整齊的麻石甚至大理石砌成，其上鑲嵌自家的堂號，還請名家題寫，如上述馮平山家族的「始平瑩域」，由岑光樾太史題字，周壽臣家族的「寶安周家瑩地」，由梁士詒題字等等。



華永瓷相保存很多名人的影像資料，這是晚清時期廣州著名人物周東生的晚年留影

瓷相的出現在上世紀初，即將人像照片，摹寫於瓷板上，以數百度的小型爐加以烤燒成的一種肖像，這種工藝在光緒年間開始出現於景德鎮，香港現存較早的實例出現在香港墳場宣統年間的華人墓葬中。進入民國初年，瓷相大行其道，甚至出現一些專門燒造的名店，華永的很多先人瓷相上，均寫有燒造店名，顯示當時燒造已經成為產業。中國人講究慎終追遠，將先人的形象留在墓

地，使後世子孫能夠如見其人，但一百多年過去，很多當年的瓷相，也隨着歲月而褪色。

民國初年的很多應用在民居建築的新工藝和材料，在華永均得到反映，如生鐵焊接成各種花紋的工藝，在民初門窗、扶手等製作中大量使用，華永也保存了部分百年的鑄鐵。歐洲進口的各種花紋地磚，香港人稱為「花階磚」，在這裏歷經多年仍然五彩繽紛，光可照人。石米批蕩是上世紀初廣東人發明的一種工藝，當時為了宣傳，稱之為「意大利批蕩」，後來竟訛傳為歐洲傳入的工藝，這種工藝選用細緻的石米，加上染色的混凝土再打磨，具有耐用及美觀的效果，在華永的「孝思亭」等建築上，均可看到民初石米批蕩的精品，經過百年風雨仍然未開裂，光潔如初。

選材方面，華永的石材除了選用此前介紹過的廣東特產麻石，連州



華永墓園中使用鑄鐵工藝，融合西式花紋，歷經多年仍然完好



華永出現的歐洲進口地磚和石米工藝，都是抗戰前香港流行的建築材料



葉母邵太夫人墓誌使用昂貴的紅筋石材整塊雕成



何啟兒媳之墓，華永唯一的全連州青石砌大墓，上有極其精美的石雕



何啟兒媳墓上的連州青石雕天使像，店名顯示為港島本地雕琢

青石之外，還大量使用了歐洲等地進口的大理石等，民國初年使用的一種歐洲進口的橘紅色花紋大理石，稱為「紅筋石」，因顏色如滿天彩霞，非常名貴，通常僅用於家具的裝飾面，而華永則有一方高達一米多，寬近一米的整塊紅筋石雕琢成的《葉母邵太夫人墓誌》，這種奢華當年不知所費幾何。華永開關之後不久，地塊就已經飽和，富貴人家只能見縫插針，在土地不足的情況下，又只能在用料和工藝上下功夫以炫耀家

族。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區德之女，即何啟之兒媳墓，佔地只有十平方左右，卻選用了全連州青石，雕工瑰麗精巧，立面兩側為兩童子手抱寶瓶，瓶中牡丹花盛放，兩側砂手又有兩天使模樣的人物，融合中西裝飾，特別的是富態的石獅子基座上還留有當年石廠的店號「港箔福林潘培記造」的字樣，顯示當年附近一帶石廠的高超水平。

民國初年華永出現之後，很多寓居於此多年的廣府人甚至外地人，也開始改變心態，願意長眠於此，因此華永和香港其他地方都出現很多不同風格的墓葬，這裏暫不討論外國風格，僅以華人墓葬而言，華永就出現了福建式和潮州式。潮州屬於閩南文化圈，其實是福建式的變體，福建式大墓的風格以繁瑣的石雕為代表，如吳國華墓即為代表，其後屏即以對聯和各種繁瑣的雕花石板裝飾，石欄上亦裝飾以人物，墓碑上顯示墓主為福建海澄籍，可知當時福建人已經安於在此長眠。



吳國華墓的繁瑣閩南式石雕工藝成為華永的獨特亮點

華永的另一特色則是雖然墓園開闢於民國初年，不過清代的功名與官銜在這裏仍然大行其道，曾經有人統計過，在華永可以找到清代從一品到九品的所有品級官銜，展現出民國初年香港華人對於清銜的概念史。

安葬在華永的人物，也一改此前為廣東本地人的單一組成，外省籍的富商名士，也選擇香港作歸宿，華永安葬的名人之中，獲得清代官銜最高的是福建籍的陳望曾。



陳望曾墓碑，誥授光祿大夫，為清代最高品級官銜，其上裝飾不是通常見到的雙鳳，而是雙龍繞護



陳望曾墓的精美閩南石雕，上有八仙等人物裝飾，打破了廣式墓葬雕花不使用人物的傳統

陳望曾（1853—1929），字省三，號魯村，原籍福建漳浦，初居宜蘭，據說出生在宜蘭西門埤仔底。16歲入洋，同治九年（1870）舉於鄉，後遷居台南。同治十三年（1874）會試登科進士，授內閣中書，先後署廣東雷州、韶州府知府，光緒二十五年（1899）三任廣州府知府，繼而奉委提調廣東海防兼善後總局，管理全省軍需，前後任事二十餘年。光緒三十四年（1908）擢任廣東勸業道，任內創水泥廠、辦理電力、自來水公司，振興實業不遺餘力，其間歷任按察使司、提學使司等銜，賞賜二品頂戴，誥授榮祿大夫。1911年辛亥革命後退隱香港太平山，民國十八年（1929）過世。陳在辛亥時已經是二品榮祿大夫，按照清代制度，過世後授一品光祿大夫，陳氏家族墓在華永南海義塚下方，佔地較大，

面向海峽，全墓用福建石工，精美華麗，尤其是後土碑，使用山字形結構，裝飾以八仙人物，令人歎為觀止。墓碑上書「清誥授光祿大夫顯考省三陳公墓」而不寫民國年號，凸顯其遺民的心態。而選擇在這裏安葬更反映出民國初年，即使清遺民大老，也開始轉變對身後事的觀點。另一重考量則是當時大陸局勢不穩定，運柩回原籍也不方便。陳氏家族墓為三座相連的砂手石墓，後屏為一道帶浮雕石欄板的石牆，上鑲嵌「漳浦陳氏宅兆」大字，「宅兆」語出《孝經》，意思是選好吉地安葬先人。

除了華永集中了較多民國初年名人之外，不少名人也選擇新界的風水寶地，香港目前保存最大的私人古墓，是位於大圍銅鑼灣山道的「玉山草堂」以及後山上的李母成夫人墓，不僅在香港，甚至在華南地區，這樣規模的墓廬加古墓的結合，也是不多見的。

墓主成夫人，是五華籍的建築商人李炳的母親，李炳字瑞琴，祖籍廣東五華樟坑，出身貧苦，清末來到香港之後，以經營石廠起家，他熱心文化與公益教育，早在光緒末年，已經與廣東的進士羣體熟悉，並且經常資助途徑香港的士子，現存「玉山草堂」中有光緒甲辰（1904）探花商衍鎰所題寫的北魏體匾額「餘慶堂」，寫於1905年，即當時他們已有交往。李母成太夫人在1915年病故，李炳的好朋友賴際熙太史為撰寫《李母成太夫人墓表》，李瑞琴又是孝子，遂出巨資在銅鑼灣山買下整座



大圍銅鑼灣山上李母成太夫人墓有獨特的高低層次，前方兩重月池為香港罕見，香爐為整塊麻石鑿成



成太夫人墓很多構件為香港之最，例如這座巨型的拜桌，重達數噸，雕有李氏「餘慶堂」隸書堂名，墓碑書法為賴際熙太史手筆

山坡，建成了這座香港第一古墓。

李炳在光緒時期，已經接辦了香港政府的許多大型市政工程，手下有一班工藝高超的客家石匠，使用香港本地盛產的優質石材，以及當時最好的其他建築物料。李母墓建成之後，又在 1918 年在山腳建了一座優雅的兩進墓廬「玉山草堂」（見後文），是香港現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墓廬建築。李母墓的墓道入口在草堂背後，設有牌坊一座，為賴際熙所書「李氏墓道」大字。沿山路緩步而上，可見大墓坐落在山巔，墓佔地近

500 平方，交椅式全石砌，從上到下依次為雙層護嶺、墓環、掛榜外有兩重踢靴、子孫基兩層，月池龐大，月池外又有方形池一重，為香港古墓所罕見，方池上有一座石雕大香爐，爐高一米多，為整石鑿成，爐身上有篆書「永享用」字樣。方池兩側有華表一對，高達三米，頂端為圓形寶珠。

整座墓均為麻石雕砌，墓碑為連州青石質，上書「李氏二十世考祖玉山府君妣成太夫人墓」字樣，字體為魏碑體，筆者審定為賴際熙太史手筆，右側文字記載了李玉山並非葬於此而是歸葬五華故里。墓碑上方與兩重護嶺正中，均有精美的石雕一組，墓碑為五福擁雲月，護嶺為松鶴圖案，二護嶺為雙蝠報喜。掛榜兩端，各雕有石花籃一個，上面盛滿石榴，寓意多子多孫。踢靴兩頭裝飾為西洋花盆，二踢靴裝飾為石鼓一對。



成太夫人墓石雕細部，各色水果除了寓意吉祥，也深具嶺南特色

整座墓地的選址，是以大帽山落脈，以金山為官星，但地勢較險，因此從方池俯瞰，可見整座墓是以巨型石擋土牆作支撐。整座墓地耗費甚巨，且工藝精美，不僅石料優良，雕工也代表了民初廣東客家石匠的最高水平。雖經一百多年風雨，墓地沒有出現開裂沉降等情形，實屬難得，今日墓廬已列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築，但是古墓本身未有評級，殊為可惜。

民國時期，新界原居民所建諸墓，比起清代已經遜色，值得一提的，是散佈在新界各地的移民大墓，許多民國軍政界人物也選擇在此長眠，其中不乏民國時期的將領。民國初年，武將通常都是坐據一方的軍閥，富於資財，來港是為了躲避政敵或歸隱山林，通常作寓公且較為低調。較有名氣的將軍，長眠在香港的，有第五軍軍長李福林（1872—1952）、桂系沈鴻英（1871—1935）等。沈在抗戰前過世，其墓地在元朗大棠，今屬私人範圍，他雖然是廣西人，但其墓葬仍沿用廣式風格。墓碑為曾任國務總理的李根源（1879—1965）題寫「故協威將軍冠南府君之墓」，字體為隸書。墓碑兩側有一對石刻行書對聯。沈鴻英夫人過世比沈更早，其墓亦在大棠，墓碑兩側鑲行書墓誌兩方，撰寫者為赫赫有名的吳佩孚（1874—1939），可見抗戰前，軍界人物也仍然遵循清末的風雅習俗。抗戰之後，情況已經有所改變，李福林將軍在 1952 年過世後，葬大埔頭的墓地雖然仍有相當規模，為兩重護嶺砂手大墓，但已經沒有墓表和其他儀仗裝飾。時代在變化，社會審美也逐漸簡單化了。



孫中山的好朋友、陸軍上將李福林墓碑



桂系上將沈鴻英墓，兩側對聯及墓碑由李根源題寫



沈鴻英夫人墓，兩側墓誌由吳佩孚撰文

香港在戰後到上世紀五十年代，人口膨脹，過世的人也逐漸增加，政府於是在戰後陸續開闢公共墓地，並且有意識將原來九龍地區的七號墳場，以及窩打老道的回教墳場等都遷往新界。

1941年，位於荃灣的第二座華人永遠墳場開始使用，這裏前望青衣島，海峽風水也不俗，山坡上還保留了一些原居民的古墓。荃灣華永因開闢較香港仔晚，且當時已經戰雲密布，抗戰之後，葬俗也起了很大

變化，所以墓葬的精美程度和規模都遠不如香港仔華永。安葬其中的名人，則有早期的余東旋（1877—1941），陳策（1894—1949）等，知名藝術家安葬於此較多，如畫家鄧芬，李研山，翰林岑光樾等。與香港仔華永不同的是，荃灣華永在上世紀中葉已經出現了以拱頂兩柱的小亭式墓亭遮擋墓碑的中西合璧方式，這種方式在香港仔極少出現，但今日已經在全港普及，其好處則是能使墓碑不受風吹雨打，石質不易開裂。

港島上另一處華人名墓較集中的公墓是1963年獲得港府正式批地興建的佛教墳場，因香港開埠之初，就已經有宗教團體獲批土地作本教教友墳場的習慣，佛教徒在香港人口頗眾，故此香港佛教墳場也成為港島精美墓園的集中地。這裏風水不如香港仔，但也能遠眺鯉魚門海峽的遠景，安葬於此的名人和家族，包括著名的佛教居士黃了因父子，銀行



陳佐乾墓以連州青石鑿成墓碑拜桌，又以銅像代替墓主瓷相，其餘瓷相則為陳氏家族先人



廖創興銀行創辦人廖寶珊墓側的墓誌，由饒宗頤撰文

家馬氏家族，陳佐乾家族等。佛教墳場雖然沒有香港仔華永的奢華氣勢，卻也在六十年代掀起華人墓葬的最後一波高峯，像陳佐乾家族墓由中國最後一位翰林刁作謙太史（1880—1974）撰寫墓誌銘，並鑲嵌了陳氏的銅像代替傳統的瓷相等；又如慈善家廖寶珊墓誌由潮州籍名家饒宗頤撰寫，以連州青石貼金鐫刻等，成為香港華人公墓的最後一抹亮色。此後陸續開闢的和合石墓園（一九五〇年代落成）、柴灣華永（1963年落成）、將軍澳華永（1989年落成）等大型墓園，使香港公墓進入現代

化時期，墓地的奢侈和精美程度，已經無法與前代同日而語了。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香港新界區的土地有部分仍然可以供原居民以外的市民安葬，因此形成了一些傳統的，原居民之外的葬區，其中有一些歷史還頗悠久，著名的飛鵝山百花林即是一例。

飛鵝山位於九龍半島東側，俯瞰觀塘，行政上屬於西貢，地勢極高，百花林在飛鵝山半山腰上，是一處傳統的葬區，這裏最具傳奇色彩的，則是清末

下葬的孫中山母親楊氏夫人（1827—1910），孫母楊太夫人於宣統二年（1910）病故後，由長子孫眉與孫中山在港朋友幫忙籌備後事，當時曾參與安葬的羅延年回憶，太夫人下葬時無使用棺木，僅以白絲綢包裹，並由羅等人以二十兩銀買下百花林村地下葬。

一年多後，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因此香港坊間一直傳說此地能蔭「帝王」，然而點穴有缺憾，因此孫中山未能正



百花林孫母墓後可見雄厚的飛鵝山主峯，據說能發帝王

式統一中國云云。當然，堪輿家言之是非，並非本書關注重點。孫母墓入口處，從登山公路側可見有石碑指示，根據歷史照片，孫母墓昔日只是很簡單的一重壟環墓，後來經多次重修才成今日樣子。墓碑只有簡單的「香邑孫門楊太君墓」字樣，據傳為中山先生手書，然而書法並無孫氏常見的模樣。

站在孫母墓前，面向墓碑，可見其後的飛鵝山主峯聳立，跌落雄厚有力，確具大地的氣勢，再看前朝，前方有一片氈唇伸展，明堂見海水，且海中羣島擁護，似禽星來朝，這種格局即使不懂堪輿者也覺開朗。但月池前的一片地，明顯為人為填成，非天然所致。

百花林附近，雖然不是政府墓地，卻也安葬了不少大墓，且有部分年代較早，例如潮州籍商人陳壽如墓，安葬於同治五年（1866），1950年重修時，改作潮汕式的「山字形」墓碑，並邀請香港名人周壽臣題寫墓聯，其位置在孫母墓下方約五十米，按照堪輿學上的「縮」字訣，其位置較之孫母更具長發的功效。附近尚有多座潮汕式舊墓，如探長呂洛的祖墳等，多屬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製作，尚算精良。

另一處較有名氣的葬地為粉嶺的蝴蝶山，即粉嶺站蓬瀛仙館的後



百花林孫母墓前俯瞰西貢海灣與羣島，氣勢非凡



陳壽如墓為典型潮州風格，兩側墓聯為周壽臣題寫

山，此山地脈連接大帽山，至大刀刃山落脈，前有道教名觀蓬瀛仙館，山地地權據說屬私人所有，吸引了不少信眾與本地市民到此安葬。

這附近從明代開始就是新界大族如彭氏的葬區，前述明代「父子鳴琴」就在蓬瀛仙館旁。這裏較有氣勢的大墓則為山麓的台山富商陳樹芬墓，陳氏墓為廣式晚清風格砂手墓，依次為后土、來龍、兩重護嶺、掛榜、兩重踢靴及拜台、月池組成，較特別的還有月池兩側的一對花崗石華表。墓碑為麻石質，碑上文字顯示墓主陳樹芬為新寧（台山）籍，官銜為二品資政大夫，即晚清商人捐納的最高官銜。墓地喝名為「真武步龜蛇」，由湖南籍的地師蕭味峯所點穴，建成時間為1914年。華表高約2.5米，頂部為一對扭頭獅子。此墓建成時，蓬瀛仙館等建築還沒建成，前方明堂應該頗為開闊，今已被其他墓葬所包圍。墓地近年已翻修一新，舊物均得以保留。蝴蝶山附近幾個山頭近年均已葬滿，其中名人墓如詠春宗師葉問墓等，偶有遊客到訪。

香港民國墓葬浩如煙海，本書只能介紹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向讀者



蝴蝶山上規模最大的資政大夫陳樹芬墓全貌



蝴蝶山陳樹芬墓兩旁華表頂端石獅子近影

簡單介紹墓葬史與社會史的流變情況，最後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發現唯一一座「洪憲」年款的古墓，坐落在林村著名的「許願樹」後樹林中，這是一座新界舊廣式墓，由一重護嶺及壘環、砂手組成，規模並不大，護嶺由附近河牀中大型卵石砌成，壘環則為青磚橫砌。唯一的亮點則是墓碑銘文：「清顯考十足，景就鍾公二位同墓，洪憲丙辰年仲春下澣吉旦立」。洪憲為袁世凱復辟帝制年號，為時僅有兩個月（1916年1月至3月），此碑稱「仲春」，正是其中的月份，既反映了香港新界市民對袁氏的態度，也為香港墓史中的有趣實例。



林村鍾氏墓碑，左側可見洪憲元年仲春字樣

抗戰勝利後，港府開始在公共墳場中，留出土地供普通市民申請安葬，上世紀中葉香港華人仍然習慣土葬，這些土地多數為非永久用地，即葬入棺木使用一定年限之後，必須挖出撿拾骸骨，重新裝入金塔內安葬到其他較為長久的區域。因土地所屬仍為政府所有，香港市民慣稱呼為「皇家山地」。相比起之前一百多年政府沒有規管的情形，可算是一大進步，尤其是窮苦的基層市民，都可獲分配山地，不再像開埠之初那樣隨便在西環山邊草草埋葬。一九五〇年代有殯葬商開始提供一條龍服務，即最基本的禮儀加上「皇家山地」連普通碑石等，以廉價套餐形式為基層市民提供喪葬服務，廣受歡迎。時至今日，政府公營墳場仍然提供骨灰或土葬位供市民安葬先人，但人口膨脹之後，需要以抽籤形式獲得。

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港府逐步立法禁止非原居民在公共墓園以外

的地方擅自安葬，只有新界原居民例外，但原居民也僅限於在本村土地範圍內選擇墓地。這法例終結了香港在山野尋龍覓地的歷史，香港墓地不可避免地進入程式化的時期，雖然仍然有富豪鋪張營造大墓的實例，但從工藝、文化上，已無法與古人相比了。

尾聲：墓碑下有甚麼？

兩千年香港墓葬發展簡史走筆至此，本應打住再談其他，不過讀者當有好奇：說了兩千年多是地上的遺跡，那麼從宋代到民國，墓地下的情況究竟是怎麼樣？

在一般讀者認知中，似乎「古代」人都是以棺木下葬。香港考古發掘宋以後的墓葬較少，根據文獻記載，可以知道，香港地區一直以來均流行以金塔盛裝骸骨下葬的做法，即所謂二次葬，先以棺木下葬，若干年後再挖掘撿拾骸骨以金塔安放。

金塔安葬的習慣，不僅在廣府，整個華南一帶，包括閩贛皖等地區均曾流行。唐宋以來，因為佛教的影響，火化也成為葬法的一種流行，香港曾經出土宋代的魂瓶（盛裝骨灰的罈罐），即當時火化的實物例證。前文所引新界鄧族的開基祖鄧符，他來到新界之後看到這裏風水好，因此把江西老家的幾代祖先「骸骨」也安葬於此，這裏可見當時江西也盛行撿骸骨的葬俗。

屯門曾經出土明代的小型墓葬，發現墓中出土的是盛放骨灰的小罈罐，可知明代本區風俗如此，如從實地考察，馬鞍山「將軍下馬三杯酒」的地勢陡峭，即使以今日的交通條件，厚重的棺廓都是無法抬到穴場的，其餘大墓如「五點梅花」等亦然，可見均為金塔葬法。

廣府墓葬中，不論傳統式的或是晚清新廣式墓，若採用棺木葬，

其棺木位置多在壟環內拜桌下方。晚清的習慣做法，是以磚砌成墓室，安放棺柩之後，再填土砌磚頂或以石板覆蓋，其上再以灰砂，三合土等夯實。若為雙人合葬墓，則分左右兩室砌磚，若夫婦其中一人先下葬者，需在族譜內附記先葬的棺木在壟環內位置，以便他日葬後死者時方便尋找位置。

金塔的葬法比較簡單，因棺木朽壞之後容易發生塌陷，故棺葬必須加固壟環內土層。金塔面積較小，不用擔心坍塌。香港地區使用的金塔，有大中小各種尺寸，較大型的，上有瓦盆覆蓋，高約一米，中小型的高約半米，通常為沿海一帶土窯燒製，也有佛山一帶的陶窯製品。

香港新界的大墓，清代很多都是二次葬金，筆者曾經考察過新界一些崩塌的古墓，發現金塔位置安放於墓碑背後，即預先留出一小龕位可放金塔高度，然後以墓碑封龕。在一些晚清民國初墓中，也有關於金塔位的提示，例如香港仔華永的周壽臣家族墓，就在拜桌上刻字：「碑安



元朗軍地後山，嘉慶十二年款古墓，石碑崩塌後，可見其後露出金塔的小龕



華永周壽臣家族墓，左右兩側墓聯下有拜桌，上有「金葬此下」字樣

正位金葬此下」，因墓地位置頗大，金塔不是按照慣常做法在碑附近，而是安葬在左側拜桌之下，必須要提醒後來的修墓者。

明清兩代廣府地區之中，客家聚居村落對於金塔的處理，往往比南番順要簡單，通常都是把金塔露天放置，其上覆蓋一個陶釉盆子，任其風吹日曬。後來稍作簡單處理，也不過是把金塔部分（約四分之一左右高度）埋在土中，以防止行人或者動物碰撞翻側。數十年之後，才流行建小型簡易水泥屋，將金塔放置其中的方法。

在現存的香港早期歐洲人拍攝的照片中，在港島區和新界區，都有野外露天放置的金塔羣照片，甚至還有洋人在野外發現露天的骷髏，與之合影的照片。這種葬俗，在廣州及附近的順德番禺一帶均罕見，與客家習俗密切相關，也可見客家流行的二次葬，必然影響清代墓葬習慣。

廣府人在開埠之後大量移居香港，因此香港在清代也必然出現真正的棺葬墓，新界地區亦然，曾經有堪輿師聲稱能從墓地外觀判斷是否棺葬或金塔葬，但各家學說不一，所謂各處鄉村各處例，從外觀上並無一定規律可言。